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： 一流的学者都是“干活的人”

采访/周语 整理/高曜

今年1月,戴燕教授将十几年来所作的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结集成书,以《陟彼景山》为题,由中华书局出版。戴燕在序言中解释了书的题名,这是取自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中的句子:“陟彼景山,松柏丸丸。是断是迁,方斫是虔。松栝有槿,旅楹有闲,寝成孔安。”意思是登上高山,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,将它们砍伐、搬运下来,建成宗庙,用于祭祀祖先。借用“陟彼景山”为题,是要表达学术上的传承和对前辈学者的敬意。书中访谈的前辈学者,包括何兆武、李学勤、章培恒、王水照、裘锡圭、朱维铮、陆谷孙、张信刚、兴膳宏、川合康三、金文京等先生。在戴燕看来,作为专业的学者,他们长期研究中国,关心中国,已经在各自的学术领域“勤勤恳恳做了很多事”,而尽管谨守学者的本分,甚少对公共事务发言,但他们其实都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。

文汇报:《陟彼景山》这本书,收录了11位学者的访谈录,记录了各人诸多学术经历和思考。这些学者都有自己重要的著作、论文,读者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文章来了解其学术生涯,既然如此,为何还要做这一系列围绕学术又不仅限于学术的访谈?

戴燕:本来不应该是我来抛头露面,这就像红娘抢了崔莺莺、张生的戏。希望大家首先能明确一点:这本书的主角是书中11位我们很荣幸访问到的前辈学者,我只是一个“跑龙套”的。

当然我也是经常在想,现在社会上老是在说要保护文化遗产,有物质的还有非物质的文化遗产,那么这些学者呢,他们做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,难道不是重要的文化?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保护?最起码是给以记录。

像何兆武先生,我们知道,他翻译了那么多重要的西方经典。从1950年代起,他就翻译卢梭,卢梭的不少作品都是他翻译的,比如《社会契约论》。他还翻译过康德、帕斯卡尔,后来又翻译科林伍德等。这些肯定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。像陆谷孙先生,他是莎士比亚的研究者,他自己的研究、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,大概是莎士比亚,但我们没有听过他讲莎士比亚课的人,好多人肯定都用过他编的《英汉大词典》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。这样的字典和翻译,在网络的时代、全球化的时代,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需要人花那么多精力去编写,可是但凡人做的工作,都不大有复制的可能,所以,何先生的翻译、陆先生的字典,仍然是无可替代的,那里面有他们的精神。

在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学者中,何先生是年纪最大的一位,已经90多高龄了,其他先



“这本书记录下的,应该说只是从一个角度对中国学界的一点观察。”

生,年纪最轻的,现在也已经退休。毫不夸张地说,他们经历过的漫长时代,都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,他们出版的书和教学经历,也凝结成了很珍贵的文化。

学者们平时在书斋里做他们的学问,时间宝贵,不大可能出来像明星一样走秀。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学术研究者,让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、年轻人知道学者的工作正是所谓“文化”的一部分,学者本身便是文化人?我恰好有一点机会来跑个龙套,因此便做了这些访谈,并将谈话记录下来,与大家分享。

我以前看胡颂平编写的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,印象很深。他是胡适晚年的秘书,一天天记录胡适的言谈。在访谈录里几乎看不到他的存在,只有胡适的言行。我是佩服这样的记录者的,所以也要请大家千万关注书中的那11位学者,重要的是他们,他们才是主角。

文汇报:书中的这些访谈,时间跨度很大,最早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,最晚的应该是在2015年。这是对受访者访谈记录的一个回顾?

戴燕:这些访谈本来在不同杂志上发表,感谢中华书局我的老朋友,是他们建议我编为一集出版,让我对自己多年的工作能有一个小结。

从第一篇访谈,到最后一篇,前后十来年。让我有一点感伤的是,这里面,我访问过的复旦大学章培恒、朱维铮、陆谷孙三位先生都已经先后离世。陆先生是在我看校样时突然去世的,我跟他说出出版社想要一张他的近照,印在书里面,他把照片传给我,两天后就走了。这几位先生的谈话,我们是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了,但在这本书里,留下了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,因此这本书的出版,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个纪念。

老实说,我本来并不觉得我们对这些学者的访谈有多么重要,因为实际上是他们本人重要,而不是我们做的事情

重要。但陆先生突然去世,多少改变了我的想法。学者们一旦离世,固然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还在,会转为“文化遗产”,可是作为文化人的他们的个体却不在了。我们常说“文化”“文化”,说来说去有时候很空,其实文化应该是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,学者们创造文化,也是文化的载体。所以,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呼吁,希望大家采取多一点方式来记录我们的学者,保护这一类文化或说文化遗产。

文汇报:您访谈的对象大多是人文学科的学者?

戴燕:这大概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,这些学者大多是我的老师辈。其中,李学勤、朱维铮先生是研究历史的,王水照、章培恒、兴膳宏先生是研究文学的,裘锡圭先生是研究古文字和历史的,陆谷孙先生是研究英语文学和语言的,彭刚访问的何兆武先生可以算是历史和哲学吧。

比较特别的是张信刚先生,他是一位科学家,经历也和其他几位先生不同。他小时候跟父母从大陆到台湾,后来到美国读书,受的完全是西方式科学训练,但他对中国文化始终有兴趣。他在香港城市大学当校长时,我认识了他,他那时正在努力推动中国文化的教育和普及。在大学管理越来越趋向科学化的今天,有他这样关心中国文化的校长是不是很难得?所以,我把对他的访问也收在了这里。

虽然我访问过的学者大多在文史领域,但是术业有专攻,他们真正的专业,也并非我能够轻易进入,这本书记录下的,应该说只是从一个角度对中国学界的一点观察。如果说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话,那就是这十年思想人文学界的一些话题,在这里都有涉

及,我们访问过的学者都给出了答案。

文汇报:从您访谈的提问中,我们也能发现,这里面有一些您长期关注的问题,您也分别询问过这些先生;从受访者的回答也能看出,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关怀。

戴燕:这些学者中,何兆武先生年纪最大,在他的《上学记》里,我们已经看到过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。其他各位基本上出生在抗战前或抗战期间,几位中国学者,都是在1949年以后上大学,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风雨雨,也经历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今天。我做访谈时,当然会考虑他们各自的专业,提一些简单的接近他们专业的问题,但实际上我比较关心的还是“世界观”和“历史观”的问题。第一个世界观,就是说从这样的年代走过来,这些学者会是怎样看待世界、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?

这些学者好像有一个共同点,他们大部分是在研究中国、关心中国,不用说,像李学勤先生和裘锡圭先生都是最顶尖的上古史专家,可有意思的是,李先生不但英文很好,他还曾学过俄语,早就有志于将中国古代和外国古代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。裘先生是研究古文字的,可是他也会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思想。当然,像何兆武先生和陆谷孙先生是对西方文化比较有认识的,不过他们也算是中西兼通,何先生自己有英文版的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,陆先生对中国文化也有他独到的见解,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和随笔。

所以,我想从这些学者那